

历史研究必须讲政治

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地指出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1986年又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讲政治》一文中指出“我们讲政治，‘要使政治同经济、政治同各项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更好更有秩序地进行。’现就个人学习的粗浅体会，结合当前我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对历史研究必须讲政治的问题略陈浅见。

当前近现代史研究的新动向

在讨论历史研究必须讲政治这个问题时，不能不涉及当前我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动向。据中共中央主办的《求是》杂志1996年第2期、第13期分别刊载的《当前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和《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两文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刊载的《本刊邀请广州部分专家学者座谈纪要》等文章介绍，北京市史学会和国家教委社科中心，1996年先后在北京召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两个学术讨论会；《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则在广州邀请广东地区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学者进行座

谈 其中主要议题之一是‘如何评估近代史研究的现状?’从这里 我们获得一些信息。

北京和广州的专家学者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近现代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一致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提倡和坚持了‘双百’方针 学术气氛活跃 打破了某些禁区 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成果不断涌现。表现在研究领域已由政治史为主扩大到文化、思想、教育、社会、城市、政党、人物、外交、华侨、灾荒、地方史等方方面面 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重大进展；在国际上建立起广泛的学术联系和交流，为确认学术的独立价值，进入规范化的学术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等等。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专家学者们还指出 目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 出现了一些突出的、引人注目的而且需要加以分析的倾向。笔者根据上述文章及有关资料，初步归纳有如下一些‘新论点’、‘新观念’和倾向：

一、淡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外来的异族文化’。有些人视马克思主义为“教条”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扣上‘教条化’的帽子。“有人公开声称：‘现在还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未免显得很可笑’”。①北京的学者们认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些奇谈怪论，“大都与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倾向有关”。②更有甚者，有的论者公然把马克思主义称作‘外来的异族文化’，攻击它‘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主张‘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成为‘代表中华民族民

族精神和民族生命力的正统思想”’③1996 年第 2 期《历史研究》发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一文在回顾了本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后说：“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经历了从近代实证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但后者的地位目前正受到新的考验和挑战。”

二、在对所谓‘近代激进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下肯定改革，否定革命。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新观点’认为有一个激进主义思潮贯穿于近代中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均是超前的、激进的产物，它不仅打断了中国的正常发展，而且是近代中国落后贫穷、动荡不休的根源所在，因此提出要‘告别革命’。

《求是》杂志 1996 年第 6 期发表的《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一文概述了否定革命论者的下述论点：1. 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这个形式的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上近代化的道路；2. 辛亥革命是搞糟了，一下子痛快地把清王朝搞掉，必然军阀混战，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3. 自辛亥革命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 49 年的革命。持这个‘新论点’者主张：“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三、过去确认的‘正面人物遭轻视，反面人物受赞扬。’这是朱英在《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发表的《晚清史研究的

新趋向》一文中的一个小标题。文章指出目前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对一些正面人物提出了种种非难 而对许多反面人物则从正面予以肯定或是大加赞扬。”作者列举了有些学者对林则徐、关天培、谭嗣同 以及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派及其领导人“从过去受到称颂的光辉革命者形象 到现在变成政治激进主义者”而受到非难。与此同时 则对“诸如慈禧、袁世凯、荣禄以及曾国藩等 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作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评价 有的反面人物还被戴上了种种辉煌的桂冠。”

四、肯定西方的殖民主义，贬损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北京和广州的学者都指出这种论点和倾向并非个别现象，他们指出“在某些人眼里 正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妨碍了中国国门的开放和西学东渐，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又一次迈向近代化的机会。”^④有的人则认为：“既然中国落后 战则必败，败则更为鱼肉 不如避战求和 与外国侵略者讨价还价 以较低的代价求得平安定。”^⑤有人对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加以称赞 说什么“到了本世纪，《南京条约》的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⑥有的论者，甚至反对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的赞美西方对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是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唯一机会。

上列的“新论点”、“新观点”人们初一听闻 并不在意 除了对于持这些论点的“勇气”感到惊讶外 对其奇谈怪论当作不懂事的幼稚者的信口之言 不予理会。事态的发展是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已被历史发展所证明的基本论断相继遭到否定，史学界经过数十年研究而得出的主要观点均面临挑战。

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与往日对近代国情认识相对立的“新体系”^⑦。北京的学者们对此给予了密切关注，指出“有的人不是从历史本身出发，而是出于某种需要，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和不真实的材料来另建一个体系，就难免引起混乱。”^⑧

值得注意的外力介入

如果说上面列举的问题仅仅是史学界人士在学术方面在一定范围内的探讨，那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现在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由于外力的介入而使问题复杂化。当前有两种外力介入，一是非史学界的研究者及其作品介绍到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二是境外力量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异乎寻常的“热心”。

非史学界的介入，主要是说近年来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对近代史上晚清历史人物的评介，由于一些人物传记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的宣传、传播，在混淆视听上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被扫进历史垃圾堆里的晚清封建统治者，一个个被打扮得富丽堂皇地搬上银幕和银屏，特别是慈禧这位“太后”的幽灵，再三再四地在神州大地上游荡。因为是文艺作品，很难要求他完全符合历史真实。而这种“慈禧热”带给不了解历史的广大观众的是什么呢？

朱英教授在《晚清史研究的新趋向》一文中介绍说，在一本有关鸦片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林则徐、关天培等非但不是民族英雄，而且是要对鸦片战争的爆发和战败负有相当责任。另一方面，现在颇受知识界赞赏的三卷本历史小说《曾国藩》的作者，一方面承认“全书中所有的情节和细节几乎都是

虚构的”另一方面又断定其“在长达 8 年的创作劳动中所写的《曾国藩》就是曾国藩 是真正的曾国藩。”言下之意 以往史学界对曾国藩的研究结论都是错的，应以文学作品描绘的为准。

朱英教授在分析曾国藩被炒得火热的现象时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报刊媒体的大力宣传，而一些出版社看到有利可图，也纷纷争先恐后地出版有关曾国藩的各种书籍 才使曾国藩变得越来越热。前段出版的《肥臀丰乳》有的报刊也为之吹嘘。事实上介入史学领域的远不止这些部门，有些地方、有些企业 为了追求名人效应 也在进行一些令人遗憾的宣传。例如某名阁竟出现严嵩的巨幅画像 某县把“地主庄园”当作商标、招牌，有的把“御”赏、玩的产品大加标榜等。结合史学研究上的“新体系”的出现，真令人耽心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失去善恶美丑的区分标准，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祖国大陆以外力量的介入。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一种是值得研究观察的。正常的介入 是指一些史学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 他们较少受传统观点的束缚，思想开放，有的曾出国留学，或到国外从事访问研究，广泛接触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他们的研究中，借用了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因而出现了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不同的结论。对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应当允许他们作为“百家”中的一家，进行“争鸣”。

关于值得观察研究的介入，则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慎重的严肃对待。北京史学界的学者指出，最近一段

时期国内出现的批判激进主义的思潮，其源盖出于西方。1990年在西班牙召开的国际历史学大会的主题就是革命与改良，当时已有人提出要破除革命的神话。10年前，台湾已有人把近代思想家分为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类。而美国学者早就提出过中国近代“救亡压倒民主”的观点。某些“新论点”实际上是西方观点的翻版。

据有关资料介绍，1988年9月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改革》为题的演讲，认为政治激进主义的极度张扬，使百余年来的近现代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演讲揭开了反省政治激进主义的序幕，当时国内不少学者不同意余英时的观点。但从近年的实际情况看，否定激进主义、肯定保守主义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并逐渐在文化学术界形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新思潮，对国内整个文化和学术研究都带来了明显的影响”。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对政治激进主义的反省涉及整个中国近代史，不仅否定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否定世界上发生过的一切革命。

如果说国内的人们正在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而没有时间去关心上述动态的话，境外的一些报刊对此则异乎寻常的热心，并作了一些带有夸张和引伸性的报道。台湾一家有影响的大报曾以整版篇幅报道中国近几年对晚清史研究的动态。该报评论说：“一股重估晚清政治改革的思潮，应读作一股否定革命、肯定改良的思潮”正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陆知识界勃然兴起，它以针对当前大陆政治、经济改革的强烈暗示和影

射 对大陆社会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⑩该报明确提出 这种‘晚清政治热’绝非纯粹的历史研究 势将冲破晚清史研究的框架而向多个领域扩散。其结论是：“中国历来有以历史代替政治思维的传统 晚清政治热一定还会往前走，……无论是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或者今天‘晚清政治热’所显示的某种极端化倾向，其实都与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有直接的重大关系 后者是前者的重要背景。”^⑪台湾报纸这样卖劲的为通过研究晚清政治来反省 实际是批判 中国近代的政治激进主义 歌颂改良主义的先生们叫好 这样明确地把他们的‘研究’和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联系在一起 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北京史学界的学者指出 现在西方的某些人对中国的近现代史好像特别‘热心’要警惕一些人通过编造历史来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相信他们的意见是有所为而发的 史学工作者必须对敌对势力‘西化’我国的企图保持清醒的头脑。

发扬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端正历史研究的政治方向

江泽民同志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中 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 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他在讲话中重申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全党要学习历史的要求，并把了解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到了能否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责的高度。党中央这样重视学习历史，使我们深感史学工作的重要

性和严肃性 不能不使我们认真审视当前史学研究的现状 端正政治方向。

中国史学界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努力发挥史学的资政、育人功能，以强烈的使命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说明搞历史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去钻故纸堆，而是从中找出治国安邦的启迪，着眼未来。近代史学家梁启超曾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把史学当作救国的大事。郭沫若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潜心撰写《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他在自序中写道：“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未来的方向。”郭老的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在研究方法和目的性上都给后人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我们更应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使史学研究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历史研究和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教育人民，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后代。纵观中国近现代史，无数先烈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效法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悲壮感人的乐章。而他们的行动又教育鼓舞后一代人前仆后继，为拯救中华民族献出自己的生命。无数事实说明，民族英雄们的榜样和爱国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抗拒帝国主义入侵的强大思想武器。搞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加强国际交往，

不能搞盲目的排外主义 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讲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不讲爱国主义，不宣扬民族英雄。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永远是中华民族的楷模和骄傲。用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教育人民 对于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 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国家就会增添强大的推动力量。

人们不应该忘记，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曾采取了“欲亡其国 先亡其史”的作法。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和强占台湾后，在其所占据的地区对学生教育就不讲中国历史 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 也长期不讲中国历史，或者只讲有利于殖民者的历史。这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学习历史的确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端正历史研究的政治方向，已成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但看来还有一些思想障碍。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也应和自然科学一样 允许探索、允许失误 对出现的失误只要适当指出就可以了 不必大张挞伐 有人则怕被看成是“僵化”、“教条”怕被戴上“左”的帽子 有人认为现在“不搞争论”让他说去 还有的则认为现在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幼稚可笑 不值一驳 或者不屑一顾等等。而另一方面，对一些奇谈怪论有所批评时，就被视为“文革遗风”、“过左”、“保守”。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需要改变。必须全面贯彻“双百”方针 而要真正贯彻好“双百”方针 又必须讲政治 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造成一种争鸣的气氛 允许对一些伪科学进行批评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 经过争鸣 对那些以忠实于历史事实为前提 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为现实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

鉴的学术观点加以确认 对那些不是从历史本身出发 而出于某种需要 用似是而非的概念和不真实的材料而编造的“新观点”“新体系”给予严肃的纠正 以正视听。同时也希望宣传媒体及文学作品 不要以“戏说”“并非历史”“纯属虚构”为掩饰，实际又在用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解说历史。

江泽民总书记在《关于讲政治》中号召 要注意分清一些基本界限 比如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的。人们高兴的看到，《求是》1996 年第 6 期和第 13 期 先后发表了龚书铎、吴效马及沙健孙同志为革命正名的文章 以具体事实和充分的说理 对否定革命的论者作了批评。读后深受启发 故在边远山城陈述管见 以求教于方家。

注：①、②、⑥见《求是》1996 年第 2 期宋小庆《当前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见《求是》1996 年第 13 期沙健孙《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⑤见《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2 期《本刊邀请广州部分专家学者座谈纪要》

⑦、⑧见《求是》1996 年第 13 期宋小庆《关于五四运动评介中的几个问题》

⑨、⑩、⑪见《近代史研究》1996 年第 1 期朱英《晚清史研究的新趋向》

（原载《贵阳文史》1997 年第 1 期，曾获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第二次会员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

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加强 贵州近现代史研究

——学习十五大报告笔记

党的十五大 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贡献，必将对今后产生深远影响。

作为史学工作者 学习十五大精神的重要任务 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 深入学习领会江泽民总书记报告精神 结合我们实际，把贵州近现代史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学习江总书记的报告，感到十分亲切，非常受鼓舞。因为十五大报告的第一部分 讲的就是中国近现代史 这正是我们近现代史研究会研究的内容。江总书记的报告，精辟的论述了近现代史上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江总书记指出：“鸦片战争后 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

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这段论述,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因为近年来史学界曾出现一种所谓的“新”见解。持这种见解的人认为,近代中国的任务是现代化,让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充分发展。而中国却出现了一系列“激进”运动,不断出现革命,他们指责这些革命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主张给革命这个词加上贬义。在对待历史人物上,他们否定传统意义上的正面人物,讴歌反动统治者和镇压革命运动的代表,如曾国藩、袁世凯、荣禄、慈禧太后之流。他们还称赞帝国主义的侵略,指责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这些来自西方港台的观点,有一定的市场,迷惑了一些人。而起来反驳的人并不多。江总书记的报告,及时指正了航向。

江总书记报告中关于“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论述,给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典范。我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对孙中山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指出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后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肯定孙中山“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

了闸门 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评价 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宽广胸襟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些是我们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工作中必须学习和遵循的。

十五大报告指出：“百年巨变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 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这是对中国近一百年历史的概括，也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从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总结出来的，是以千百万人流血牺牲为代价换取的。百多年来许多志士仁人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历尽艰辛 进行过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 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最后 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战胜了强大的内外敌人 洗雪了百年屈辱 中华民族终于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史学工作者要遵照江泽民同志多次指出的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和国情的学习和宣传的要求 深入认识和把握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的光荣传统，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学了十五大报告后还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加深了使命感和紧迫感。报告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 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 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 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 各个方面

相互配合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报告以一定篇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任务 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 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体到我们从事的社科工作来说 报告指出：“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从字面上理解，一系列的“切实加强”、“重要性和紧迫性”、“重要意义”等 都用在文化建设上 决非寻常。在现实生活中，更使我们感到这种重要性和紧迫性。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是一件小事和容易办到的事。“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苏联解体、东欧巨变都有前车可鉴 因此史学工作者肩负重任 不仅要研究还要下大力加强宣传工作，使更多的人来关心天下兴亡的道理。我们要更认真地学习十五大文件 提高自己 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

（原载《会讯》第 15 期）

研究历史 任重道远

江总书记在给白寿彝教授祝贺《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信中发出了“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的号召。对我们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不仅给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我们增添了使命感和责任感。经过学习，谈一点初步感受，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党中央三代领导核心 都一直重视和提倡学习研究中国历史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同志，一直都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一部《资治通鉴》不知读了多少遍，到他的晚年，都还在读这本书。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借鉴前人的经验，寻求治理国家的方针和方法。在革命圣地延安，尽管当时条件很艰苦，各项任务十分繁重，毛泽东就很强调要加强对现状和中国历史的调查和研究。他向一切有能力的人提出要求，一是要研究理论，二是要研究现实，三是要研究历史。他曾经有一句很深刻的话，批评一些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而对自己的老祖宗，对不起，忘记了（大意）”。纵观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他之所以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建立新中国的艰巨任务，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中国历史有透彻的了解和研究，根据中国国情来决定党的方针政策。

他没有照搬苏联经验，没有拘泥于马列和斯大林的片言只字，而是采取有中国特色的战略和战术，才能领导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我们大多数人亲身经历的。尽管《邓小平文选》三卷中在字面上直接提出要大家学习和研究历史的地方不多，但在整个邓小平理论中都贯穿着总结历史、认清中国国情的精神。其中关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就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是透彻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得出的结论。这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考虑的，又是总结了建国后的经验教训的科学结论。对“十五年超英赶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那种马上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良好愿望，对那种不切实际的梦想，邓小平同志没有直接去批驳，而是用“初级阶段”来纠正。还有一些涉及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的讲话等等，都说明邓小平同志以自己的卓越见识来对待历史学习和研究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多年来一直强调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历次党代表大会和发布的通知中，多次提出要对国人进行“三史一情”教育、“三史一传统”教育，“三史”指的是近代史、现代史、革命史；“一情”就是国情，“一传统”就是“革命传统”。除对青少年进行教育外，江总书记一直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注意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